

第六章 結論

在國際體系中，影響決策者對其自身國家角色認知之因素主要取決於各自國家的國家特性(national attributes)。而美國學者East認為國家特性應包括以下三方面內容：一、國家所擁有資源。二、將潛在資源轉換為實現的外交目的現實手段或能力。三、影響國家運用這些資源和實力的傾向或手段要素。¹因此，就第一及第三點而言，中共無疑地是一個擁有豐富資源及悠久歷史文化的大國。但就其第二點而言，中共顯然一個尚在發展中的國家。如同鄧小平所說：「我們是一個大國，這個大國又是小國。大是地大人多，地多還不如說山多，可耕面積並不多。另一方實際上是小國，是不發達國家，或叫發展中國家。如果說中國是一個和平力量、制約戰爭的力量的話，現在這個力量還小。等到中國發展起來了，制約戰爭的和平力量將會大大增強。」²換言之，中共國家目標乃欲發展成為國際政治、經濟的大國，進而成為國際安全體系之重要一「極」。除了可一洗中國近代二百年的民族屈辱，更可再創中華五千年悠久歷史的另一高峰，以強化中共政權的歷史定位。

然而，中共深知欲達此國家目標必須要在有利的國際戰略環境下，才可能實現。因此，隨著後冷戰時期中共綜合國力日增，崛起態勢明顯，為除去西方各國對「中國威脅」的疑懼，中共發展出一套「和平崛起」概念。然而卻因其內部仍有許多雜音，同時加入其對臺政策中「不放棄以武力解決臺海問題」因素後，使得中共改以「和平發展」為其後冷戰時期外交策略主要基調。但無論是「和平崛起」或「和平發展」，在中共對外戰略類型延續其於改革開放後之「積極守勢戰略」，並透過「夥伴關係」或「大國外交」等外交手段，選擇與現存國際體系、秩序及主導性大國採取合作，同時積極參與國際事務，以創造有利其崛起之國際環境。其中，中共對歐盟戰略亦服膺於此戰略架構下發展。

綜合而言，隨著中共與歐盟建交至今30年期間，中共改革開放及歐盟整合在程度上所獲得的成效，似乎亦反映了國際政治大國之間的分合與消長觀點。簡言之，中共及歐盟這兩強權擺脫了冷戰時期對美蘇兩超級大國間派生性關係，而逐步在後冷戰時期對於國際政治、經濟及安全環境上發展其獨立性關係，進而對國際體系結構產生直接且深遠的影響。

對中共而言，發展與歐盟關係，一直是中共對外政策的重點之一。尤其，

¹ Maurice A. East, "National Attributes and Foreign Policy," in *Why Nations Act: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for Comparative Foreign Policy Studies* eds. Maurice A. East et al. (Beverly Hill/London: SAGE Publisher, 1978), 130-135. 轉引張清敏，〈中國的國家特性、國家角色和外交政策思考〉，《太平洋學報》，第2期(2004年)，頁49。

² 鄧小平，《鄧小平文選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頁105。

自後冷戰時期以來，中(共)歐之間在政治外交、經貿科教文化等各領域的合作關係發展迅速。如今，歐盟不僅已超越美、日而成爲中共第一大貿易夥伴，其地位更因在國際事務中雙方反對單邊主義，主張多邊主義及重視聯合國作用而正逐步朝向全面性戰略夥伴關係發展。不過，中(共)歐之間並非沒有任何矛盾與分歧，唯在地緣政治上，兩者並不具有直接威脅性，故雙方都願意採取對話而非對抗，並在中(共)歐戰略合作的框架內，尋求互諒互讓之解決之道。此外，歐盟亦堅持「一個中國」政策，並明確表示反對「臺獨」，支持中國和平統一。因此，中(共)歐關係在沒有受到臺灣問題的干擾，這是與中(共)美亦或中(共)日關係有著極大的不同。以下筆者則就本文之研究發現及研究啓示加以說明之。

第一節 研究發現

誠如國際關係學者 Holsti 所言：「當我們解釋國家行爲的時候，不僅會涉及外在環境，而且是主要涉及影響決策的國內環境。」³因此，中共自建政以來，其戰略因時空環境的變化而有所改變。尤其，中共對國家利益的界定、內在與外在環境的認知、歷史的經驗教訓，以及戰略文化的傳承等因素，皆影響著其戰略的走向。

由於戰略本質在於對抗威脅，故就世界形勢發展來看，進入後冷戰時期，中共受到的威脅仍是多元的。此乃由於中共是一個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的政權，因此中共當務之急乃是將社會主義所面臨的「滲透與反滲透」的政治安全始終列爲首要。同時，中共亦瞭解參與和營造新世界經濟秩序所引起的「遏制與反遏制」的經濟安全更形重要，以及在穩定亞太地區、促進多極化發展所遇到的「爭霸與反爭霸」的國家安全成爲中共不容迴避的政治現實。⁴

雖然，中共深受中國傳統儒家文化影響，極欲表達給國際社會的心情，是中共無意強出頭。但對現實主義者而言，中共「主觀上」想不想當霸權是一回事，但在「客觀上」的不出頭卻已經明顯感受出中共具有霸權的絕對條件與實力，而「主觀上」的不出頭只是時機未到的託辭。因此，處在這種交錯的國際關係視角下，中共自然面對了一種悖論。事實上，吾人可由中共「大國外交」及「夥伴關係」觀察得知，前者透露了中共積極扮演國際結構重要角色的目的，而後者則體現當前中共成爲區域霸權的目的。然而令中共百口莫辯的是，外交實力需要仰賴經濟與軍事發展，不管哪種發展形式都遮掩不住中共一種「崛起霸權」的姿態。而這正說明了中共的外交政策總強調著「和平」，西方國家卻都

³ 霍斯帝(K. J. Holsti)，《國際政治分析架構》(International Politics: A Framework for Analysis)，李偉成、譚溯澄譯(臺北：幼獅出版社，1989年)，頁19。

⁴ 劉慶元，《解析中共國家安全戰略》(臺北：揚智文化事業公司，2003年)，頁71。

只看到「崛起」。⁵

爲此，筆者即針對「後冷戰時期中共對歐盟戰略」之面向加以研究，試圖藉由中共對歐盟戰略類型及外交政策取向來分析中共面對國際政治、經濟、安全環境的變遷之反應，並探討中共對歐盟在政治、經濟及安全利益上互動狀態，以進一步說明中共在推動其「大國外交」中之所以特別看重歐盟，其主因乃與中共戰略制訂的國家利益或國家目標有關。綜整本文有關研究發現分述如下：

- 一、在現實主義理論架構下，後冷戰時期中共戰略類型乃爲「積極守勢戰略」。其戰略主導理念特點如下：⁶
- (一) 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共戰略的主導理念，乃以積極守勢現實主義爲核心。雖然自由主義的理念(例如多極化、全球化、新安全觀)不時成爲中共重要的中介變數(Intervening Variable)，但建構中共自身戰略的基本思考點仍是以「國家利益」爲出發點的現實主義。
 - (二) 融合傳統中國的「圈層戰略」理念。此說明中共戰略的主導理念，當以自身爲中心、周邊區域爲優先重點，積極推動「夥伴外交」，以建立一個可供和平發展的周邊環境，並進而以東亞區域發展爲核心，爲自己營造出「和平崛起」的環境。
 - (三) 堅持「改革開放」基本路線。此說明中共戰略的主導理念，當以經濟主義(Economism)爲首務。所謂經濟主義，既包含以經濟建設爲中心的國內戰略如「三步走」戰略之安排，亦表明以「經濟外交」方式的戰略設計。進一步說，中共之所以要積極參與經濟全球化，主因乃爲使中共經濟持續高速發展，進而使自己成爲世界經濟大國。
 - (四) 致力推動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建立。此說明中共戰略的主導理念，當以制度主義(Institutionalism)爲主要手段。國際關係的無政府狀態並不是混亂而無秩序，而是與向縱深發展多元化進程相伴隨的制度整合進程。在這個進程中，中共在國際政治方面，經歷了從身處邊緣、被動消極參與到主動積極建構。同時在國際經濟方面，則大力促進東亞整合，創立有助於區域經濟和進一步經濟開放的區域性國際制度，皆說明了中共積極融入國際社會的表現形式，同時也是中共和平崛起被國際社會接受的重要標誌。
 - (五) 強化「大國關係」。此說明中共戰略的主導理念，當以協調主義爲主要途徑。由於後冷戰時期以來，各大國均抓住有利機遇，爲實現自身戰略目標而競爭，故其突出特點乃是大國之間的合作與政策協調不斷加強。中共戰

⁵ 朱新民、陳銘顯，胡溫體制平衡戰略的評估與展望，收錄《胡溫體制的平衡戰略 - 思維與政策》，朱新民主編(臺北：遠景基金會，2005年)，頁275。

⁶ 參閱門洪華，中國大戰略的主導理念，《學習時報》，283期，2005年5月15日，<http://www.54479.com/study/shownew.asp?newsid=487>

略的謀劃，主要乃在強調大國關係協調的重要意義，避免非核心戰略利益上的衝突，以合作的、建設性的姿態追求其戰略目標的實現。

(六) 追求自身「角色定位」。此說明中共戰略的主導理念，當以形象主義為主要目標。因此，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之後，中共將「負責任大國」作為其國際地位的標誌，積極提供全球性和區域性公共物品，逐步樹立起負責任的國際形象。故塑造一個負責任、建設性、可預期的國際形象對中共戰略目標的實現至關重要。

綜合而言，中共戰略的主導理念，既代表着中共對中國傳統戰略觀念的繼承，也體現了進入後冷戰時期戰略觀念創新。其中，現階段中共戰略側重於「大國外交」，而在中(共)歐、中(共)美及中(共)日關係比較下，因中(共)歐雙方因在經濟上具互補性及安全上無直接威脅性而發展快速，乃至於正朝向「全面戰略夥伴關係」發展中。因此，筆者認為在中(共)美、中(共)日夥伴關係因在政治、安全上有所矛盾而無法進一步提升時，中共對歐盟戰略隱含著「統一戰線」意涵的「遠交近守」戰略，其目的乃在其重要戰略機遇期，實現「三步走」戰略目標之達成。

二、後冷戰時期中共對歐盟之政治、經濟及安全利益及戰略定位

從現實主義角度而言，國家利益為一切對外行動之動機來源。而政治利益、經濟利益和安全利益為構成國家利益之基本核心。其中，經濟利益是所有國家利益之物質基礎，政治利益是經濟利益的集中表現，而安全利益則是政治經濟利益在國家關係中的延伸。三者構成相互聯繫、相互影響、相互制約的矛盾統一體。⁷是故，筆者就政治、經濟及安全利益方面加以說明後冷戰時期中共對歐盟之戰略定位：

第一，在政治利益方面，冷戰結束後，中共與歐盟關係產生結構性的轉變，因為中(共)歐共同敵人已不復存在，故中(共)歐雙方皆有意藉由加強經貿合作，提升自己國際政治地位。雖然在後冷戰時期初期，雙方關係受到「六四事件」影響而有所停滯，但很快地歐盟便採取積極主動的作為。由歐盟於1995年發表第一份全面對華政策文件《歐盟對中共長期政策》，乃至於2003年9月10日歐盟發表第五份對中(共)戰略文件《歐中關係的共同利益與挑戰—走向成熟的伙伴關係》，將歐中(共)「全面夥伴關係」提升為「戰略夥伴關係」，以及中共於同年10月13日發表有史以來第一份對外關係文件《中共對歐盟政策文件》等一系列重要文件來看，中(共)歐政治關係正朝向正面的、合作的發展方向。雖然，

⁷ 門洪華，中國國家戰略利益的拓展，《戰略與管理》，第2期(2003年)，<http://www.54479.com/study/shownews.asp?newsid=436>

中(共)歐夥伴關係前的頭銜未必符合雙方在「夥伴關係」架構下合作的實質內容。不過，筆者依然認為透過不同層次「夥伴關係」的名詞公開宣示，乃蘊含著對雙邊關係的特殊期待與指涉。其中，更代表了中共就其國家利益的優先順序，並將「夥伴關係」從戰略性的、長時期的高度來看待，而非只是短期內一種單純的權力遊戲策略。畢竟，「夥伴關係」的建立需藉由當事國雙方共同努力，而非單方面一廂情願的認定。另外，在現實主義考量下，歐盟也隨著中(共)歐夥伴關係不斷提升，在國家利益上不斷由政治上的「虛」轉化為經濟上的「實」，意即將政治問題經濟化，其中人權問題即是最明顯的例子。故在政治戰略定位而言，筆者認為中共將歐盟視為「善意夥伴」。

第二，在經濟利益方面，中(共)歐兩者皆欲積極地追求更大的資源運用能力，以使其綜合國力最大化。因此，隨著世界經濟的區域化快速發展，並逐步朝向全球化發展趨勢，中(共)歐經濟規模不斷擴大。就中(共)歐貿易與投資現狀的統計分析來看，相當程度上可以說明雙方的經貿互補程度及特點。然而，中(共)歐之間經濟「互補性」亦說明中(共)歐經濟社會發展水平的不對稱。特別是反傾銷及市場經濟地位問題，使得中共成為全世界反傾銷調查案件最多的國家。同時，中共亦認為歐盟對其「市場經濟地位」的判定，視為是政治問題而非經濟問題。而其主因乃為歐盟認為「經濟安全」受到威脅使然，故中共除了一方面藉由凸顯歐盟寧願承認國家經濟自由度指數較低的俄羅斯市場經濟地位，而不願承認中共市場經濟地位的歧視性及不合理，並軟性訴求歐盟應將「政治歸政治、經濟歸經濟」。另一方面，中共則依循加入世貿組織一樣的「先易後難」及「先近後遠」策略，藉由其本身市場優勢，積極爭取東協國家承認其市場經濟地位，並建立以韓國－澳大利亞－日本－加拿大－歐盟－美國的順序，尋求各個擊破。故在經濟戰略定位而言，筆者認為中共將歐盟視為「求大同存小異」的「互助夥伴」。

第三，在安全利益方面，中(共)歐雙方皆認為世界政治應由「一超多強」的單極多邊體系，繼續朝向多極化體系發展。儘管現今美國依然為世界唯一的超級強國，但後冷戰時期歐盟與中共的實力與影響力均大為增強。特別是，中共改革開放取得巨大的成就，使得中共成為綜合國力不斷提升，因此中共現已逐漸將其自身定位為區域大國。換言之，在國際安全上，中共對亞太地區，甚至對世界的影響力正在擴大。而其他國家同時亦正在以新的角度與立場審視中共，並且存在不同的交往觀點。不過，由於攸關中共統一的「臺灣問題」至今仍未完全解決，而身為全球霸權的美國亦再三強調須以和平方式解決「臺灣問題」，否則不排除以武力介入爭端。此舉則被中共視為干涉內政，故在1990年代中期在中共經濟發展達到一定成效時，急欲平衡其在軍事安全上的相對弱勢，以防止外力介入「臺灣問題」，故希望藉由歐盟解除自1989年實施對中共武器禁

令，以獲得更多來源且效能更好的武器。然而，就短期來看，由於歐盟成員國皆有其國家利益考量，在安全上仍多有求於美國而尚無法完全「獨立自主」，故目前有關解除對中共軍售禁令仍有所阻力。但筆者認為，隨著中共綜合國力的增強，及歐盟本身為平衡中(共)歐經貿差距的考量，未來仍朝向有限度的解除禁令來考量。不過，屆時對中共而言也許只是象徵意義大於實質意義的動作而已。故在安全戰略定位上，筆者認為中共將歐盟視為仍無法敢向美國說「不」的「合作夥伴」。

綜合言之，現今中(共)歐關係正朝向建立夥伴關係最為親密的「全面戰略夥伴關係」的層次。換言之，顯示中(共)歐雙方有意在全方位(包含政治(外交)、經濟與安全等方面)追求合作。尤其，面對全球化所帶來的機遇和挑戰，中共在政治(外交)和安全領域進行了重大戰略性調整，這種調整使中共與歐盟在大戰略目標和利益上有了更密切的關聯，雙方重大國際問題及安全理念上有了更多的一致性和互通性，為雙方發展戰略互信，在政治(外交)和安全領域發展合作提供了必要的前提條件。

不過，由於中(共)歐社會制度、價值觀念、經濟發展水準等方面的差異，造成雙方關係在今後的發展過程中出現各種問題，因而產生某些障礙，並對中共的安全構成挑戰。但中(共)歐關係中的「國家利益」積極因素始終是主流，平等互利、相互尊重亦因此成為總體趨勢。換言之，歐盟對於中(共)解除武器禁令及承認中共市場經濟地位等問題，遲早會因考量現實主義的國家利益因素下獲得而解決。正如2001年5月歐盟委員公佈的《歐盟對華戰略－1998年文件實施情況及進一步加強歐盟政策的措施》的結束語中所說，「無論從政治上還是經濟上講，歐盟和中共在雙邊及全球事務中建立全面夥伴關係符合歐盟和中共的利益，有助於提高歐洲和中共人民的生活品質」。⁸換言之，就現實主義者而言，中(共)歐關係亦深切地反映出「沒有永遠的敵人，也沒有永遠的朋友，只有永遠的國家利益」的不變原則。

至於，中共是否有意與歐盟聯手來對抗美？筆者認為，中共深知如欲以冷戰時期思維唯武力原則來「聯歐抗美」，基本上在現階段是不可能實現的。但若在「新安全觀」的架構下，以「互信、互利、平等、協作」核心價值及「不對抗、不結盟、不針對第三者」三原則結合在力量對比、戰略利益及經濟利益上皆對彼此有正面效益的歐盟，至少將可制約美國單邊主義，進而朝向國際多極體系發展。為此，筆者認為中共有意透過中(共)歐全面戰略夥伴關係此等「心照不宣」的方式，採取「明聯歐，暗制美」的積極守勢戰略，以實現其「三步走」戰略目標。不過嚴格來說，其與「聯歐制美」戰略，在制約內涵及程度上

⁸ Commission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EU Strategy towards China: Implementation of the 1998 Communication and Future Steps for a more Effective EU Policy*, COM(2001) 265/final, in the conclusion part.

仍有所差異。尤其，對於「明聯歐，暗制美」的實際效果而言，筆者認為「制美」須視個案而異。畢竟，歐盟亦是現實主義實踐者，在考量國家利益下，歐盟仍將以何者對其較有利的「相對利益」為優先，否則將對「明聯歐，暗制美」的涵義理解稍嫌狹隘。

誠如美國學者沈大偉(David Shambaugh)所言，隨著中共日益成為重大國際事務的積極參與者，同時一個歐、美、中(共)各執一邊的新戰略三角正逐步形成。相較於1970年代和1980年代的莫斯科－華盛頓－北京的舊戰略三角後，新戰略三角是一個各方都受益的三角，因為所有三方的利益都共同交織在一起，其中兩方不會結成針對第三方的戰略聯盟。而歐、美、中(共)三方的關係將是一種不穩定的和變化之中的關係，相互立場有時聚合(converge)，有時出現分歧(diverge)。⁹不過，就目前而言，這個新戰略三角尚不會一蹴而就，即刻形成。原因乃在於歐盟內部不統一，美國只想長期保持資金的經濟霸主地位，而中共崛起無疑同美國在地域政治利益發生衝突。

展望未來，中(共)歐關係的發展前景將越來越寬廣。這是中共、歐盟和整個世界這三者內在發展的必然結果和客觀需要。經濟學人智庫在《2006年全球經濟展望》一書中預測，以實質購買力衡量，中共大陸將於2017年就超越美國。而歐盟25國占全球經濟比重，預計20年後將由現在21%下降至16%，除非不斷增加新成員，如人口數較多的土耳其或烏克蘭。另外，全球經濟重心將由北方移至東方與南方，文化與政治強權也將同步轉移。20年後，美國則可能需要與其他三根支柱，歐盟、中共、俄羅斯重建全球新秩序。¹⁰綜而言之，對於崛起中的中共而言，筆者認為只要其能審時度勢，抓住機遇，自我戰略定位準確，同時運用靈活外交策略或手段，求同存異，即能趨吉避凶，使中共的經濟安全和現代化建設開創良好的國際環境。

第二節 研究啓示

從較長的時間來觀察一國在國際政治、經濟及安全環境的發展演變，不得不讓人對世事之無常以及變動因素之意外而有所驚嘆。即使在發展已趨於完善的國際關係理論中，國家比如是演員一般，各種國際角色與行為者互動之原理、機制及情勢環境雖都做了廣泛且深入的研究探討，但參與角色分量之增減甚至上場或退場時機，能出於當事者主觀意志者並不多見，反倒是國際環境的客觀情勢，將特定國家或國家集團推向舞臺中央成為世人注目的焦點。換言之，時代趨勢乃引導著各個國家或國家集團之戰略制訂。熟能洞察先機，掌握時勢者，

⁹ David Shambaugh, "The New Strategic Triangle: U.S. and European Reactions to China's Rise,"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28 (Summer 2005): 21-22.

¹⁰ 陳一姍，2017年中國將成第一經濟強權，《中國時報》，2005年11月21日，版7。

進而採取正確的戰略，則其實現國家目標之可能性則愈高。

事實上，戰略可謂一種觀念，一種思想，更是一種民族智慧的結晶，社會經驗的累積。¹¹其中，戰略觀念的形成和演變又與環境因素有關，概可分為五大類：一、時代；二、地理；三、社會；四、文化；五、技術。因此，當研究戰略思想有關問題時，總須先分析其環境因素，始能獲致較深入的了解。¹²進而言之，戰略能否成功，取決定於天時(時代)、地利(地理)、人和(社會、文化、技術)三者是否相互搭配。如同戰略大師薄富爾所言：「任何戰略決定(strategic decision)的作為，都必須在下述三個主要座標(main co-ordinates)所形成的結構之內。這三個座標就是：(一)時間。(二)空間。(三)所能動用的力量之規模和素質(精神)。」¹³質言之，戰略並非一成不變，而需視在不同的環境調整應對，進而逐步達成國家生存和發展之目標。

美國文人戰略家荷馬李(Homer Lea, 1876-1912)認為，國家好比個人一樣，都是一種有機體，同受自然環境的支配。換言之，人類無法與自然對抗而只能適應，國家亦復如此。同時，荷氏亦認為國家有著如同人一生中所經歷的生、老、病、死四種際遇。對於國家而言，「老」的意義就是成長(growth)和發展(development)，而「病」就是衰頹(decline)。國家若不繼續成長和發展，也就開始衰頹。進而言之，成長又即為軍事擴張(military expansion)，擴張為民族活力的表現，也就是生存鬥爭(struggle of existance)。¹⁴

由本文第二章可知，中共戰略類型是由「消極守勢」轉化為「積極守勢」，並朝向共同外交政策目標，實現國際體系多極化而邁進。進而言之，「消極守勢」之於國家「生」之歷程如同「積極守勢」之於國家「老」之歷程。換言之，在現今「中共崛起」已成爲不可逆之勢時，中共雖然有意在「和平發展」的時代潮流下擴大自身在區域，甚至在全球影響力，但其成長與發展，也必然衝擊現今世界霸權美國的國家利益。而這也是學者Mearsheimer認為的大國政治之所以最後會演變成悲劇的原因，即新的霸權會不斷地挑戰舊的霸權的地位，而舊的霸權則會不斷地壓制新的霸權崛起。

雖然中共多次公開說明其無意與美國爭奪世界霸主，但就現實主義而言，唯有以朝向霸權取向發展，進而在戰略類型上採取「積極攻勢戰略」，才得以求其最大的行動自由。尤其，現今中共欲藉由追求其國家利益，以實現其三大歷史任務：「繼續推進現代化建設、完成國家統一、維護世界和平與促進共同發

¹¹ 鈕先鍾，《西方戰略思想》(台北：麥田出版有限公司，1999年)，頁16-17。

¹² 鈕先鍾，《西方戰略思想》(台北：麥田出版有限公司，1999年)，頁17。

¹³ 薄富爾(André Beaufre)，《戰略緒論》(An Introduction to Strategy)，鈕先鍾譯(臺北：麥田出版有限公司，1996年)，頁46。

¹⁴ Homer Lea, *The Valor of Ignorance* (Harper, 1942), 12.轉引鈕先鍾，《西方戰略思想史》(臺北：麥田出版有限公司，1995年)，頁533

展」。¹⁵因此，筆者認為在其持續推進現代化建設的同時，隨著「臺灣問題」的國際化，不僅對於中共「和平崛起」或「和平發展」是一項時代考驗，亦是中共「積極守勢戰略」是否轉換為「積極攻勢戰略」的重要觀察指標。

不過，筆者亦認為倘若一國對外能夠長存「持盈保泰」之「善霸」之態，亦即以增加國家資源轉化能力(如政治、外交、文教等)為導向，嚇阻敵人挑釁或攻擊，以達到中國兵學「不戰而屈人之兵」的最高境界，或許將可跳脫「安全困境」的迷思。換言之，國家應著重於國家資源「能力轉化」而非「武力運用」，此即所謂守勢現實主義的「權力平衡」精義。如此，荷氏所認知的「軍事擴張」未必成為國家以增加國家資源的唯一手段。可惜的是，就人類歷史而言，每當一大國崛起而獲得較大權力時，總是動輒以實現其國家目標或保護其自身國家利益，而恣意地運用武力以獲得自以為「需要」但非「必要」的國家資源，使得原欲成為理想的「善霸」最後卻質變成為現實的「惡霸」，進而造成大國之間緊張、衝突與不安，最終又淪為大國政治無法跳脫的悲劇。

¹⁵ 章沁生，面對新世紀的戰略思考，《解放軍報》，2001年1月30日，<http://www.future-china.org/fcn/ideas/fcs20010130.htm>